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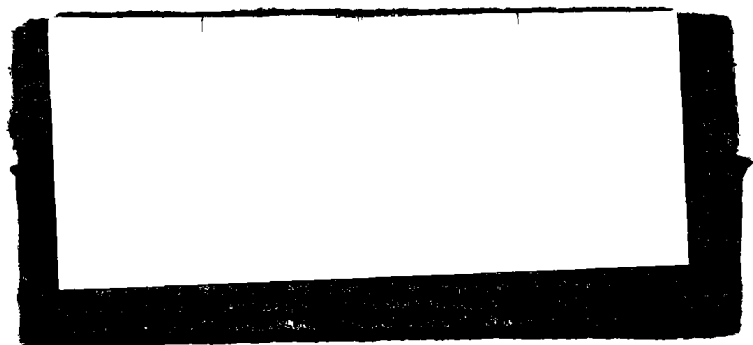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第二分册

人民出版社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恩 格 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兵 卒 书 店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根据 1972 年 4 月第 1 版重排
197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844 每册 1.00 元

附 录

普列汉诺夫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译本
所写的序言和注释¹

俄译本第一版译者的话

当恩格斯论费尔巴哈这部杰作的译本问世的时候，我想略为谈谈它对俄国读者的意义。

现在我们这里洋洋得意的反动派也披上了哲学的外衣，例如，《**哲学和心理学问题**》² 杂志就证明了这一点。六十年代的否定派被诬蔑为极其轻率的没有根据的东西，而阿斯塔菲也夫分子、洛帕廷分子以及类似他们的爱智派，却被认为是哲学上的伟人（例如，见雅·柯罗鲍夫斯基先生所写的《俄国人的哲学》，该篇附在他译的宇伯威格—海因泽的《**近代哲学史**》一书中）³。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必然要理会这个哲学反动派，因而就要研究哲学。在哲学领域中，也象在经济和政治的领域中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最可信赖的领导者。我所推荐的这本小册子，是集了这两位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的大成。

这本小册子写得非常简练。因此我必须给它加上若干注释。其中较长的注释附于书末，用注码标明。此外，书中还有两个附录，一个附录（《卡尔·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是在德文版中就有的，另一个附录（《卡尔·马克思论法国唯物主义》）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中摘录下来的。但我不是直接摘录

来的，因为这本书是奇缺的珍本书⁴。关于法国唯物主义一节，我是从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杂志《新时代》上翻译过来的，在数年前该杂志曾经转载过这一节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关于布·鲍威尔，可参看注释^④）的论战，在全世界文献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最新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首次坚决的发动。这次发动无论就其历史意义或内容来说（仅就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部分来判断），都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它在俄国仍然可以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在俄国，甚至连最进步的著作家对社会生活仍然顽固地坚持唯心主义的观点。倘若我们手头有这部著作，那我们会乐意地促使该书用俄文出版。但何时可以如愿以偿，我不得而知，目前只好满足于翻译其中的一节^①。这一节和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言论有密切的联系，它是相当完整的，就其思想的丰富性来说，该章远远超过了朗格的那部论述近代唯物主义的篇幅浩繁的名著。我们提醒读者特别注意马克思所指出的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恩格斯论费尔巴哈这篇著作，是针对施达克关于费尔巴哈的一本书而写的。但在这篇著作中却很少谈到这本书，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序言中谈它了。至于一些必要的资料，读者可以看注释^②。

格·普列汉诺夫

1892年6月

① 该文收在梅林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1850)》第2卷中。

俄译本注释^①

● 作者是指海涅论德国的几篇文章，它们最初发表在《两大陆评论》上，以后又出过单行本（单行本第一版的序言所注的日期是1834年12月）。读者可在《海涅全集》中找到他的这一杰作⁶。可惜它的俄译本却被书报检查机关弄得面目全非了。

现代的阿里斯托芬对待他同时代的哲学，同那位天才的希腊人对待“诡辩学派”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不仅了解德国哲学的革命意义，而且正由于它有革命意义，才对它表示热烈的同情。但是，海涅在其《论德国》的书中，谈康德（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革命意义——〈被他夸大了的〉——比谈黑格尔的革命意义要多得多。关于黑格尔，早在四十年代他就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在保存下来的他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论德国》的信的片断中，我们发现作者跟“哲学之王”在诙谐地交流思想。“有一次，当我发现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困惑不解时，‘哲学

^① 普列汉诺夫的注释共十一条，是在1892年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俄译本第一版写的，1905年俄译本第二版时又作了修改和增补。修改和增补部分在本书中用尖括号〈〉括起来，修改时删去的有关部分单独刊出，见本书第139—145页。——译者注

之王’颇有点奇怪地发笑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之后他惊惶地环顾左右，而又平静下来，并相信只有亨利希·贝尔听见了他的话。”⁷在这里，亨利希·贝尔究竟是谁，这是无所谓的。这里应当指出的只是：海涅认为黑格尔本人了解自己哲学的革命意义，但害怕把它表露出来。这样一种对黑格尔的看法，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正确性，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在我所推荐的这本小册子里已经作了回答。然而有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即海涅本人决不属于那一类对黑格尔哲学所得出的**结论**表示害怕的、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人物。在所引用的那段对话中，海涅改变了黑格尔的著名原理，不提**现实的**，而泛泛地谈**存在的**，这不是无意的。显然，海涅是想表明，尽管一些很少知道黑格尔哲学的奥妙所在的人在口头上谈这个原理时把它庸俗化，但它仍旧保持**其革命的意义**。——第8页。

● 大家都知道，如何理解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学说，这个问题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的我们的哲学界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正由于这个问题，俄国著作家中间一位头脑最清醒的著作家别林斯基，可以说是演了一幕悲剧。他的关于门采尔和博罗迪诺纪念日的两篇论文⁸，对敢于斥责“现实”、即斥责人们周围社会关系的人，充满最辛辣的敌意。后来他非常不喜欢提起这两篇文章，认为它们是可耻的错误。他在激烈地否定腐朽的俄罗斯制度时，已不拘泥于关于这些制度似乎是合理的任何

哲学见解了。别林斯基之后在这方面从事著述的人，都认为无须回复到黑格尔去，无须检查这位天才批评家在其保守倾向时代所依据的那些理论前提。在他们看来，这些前提中除了错误之外什么都没有。现在一些“进步的”俄国著作家也抱着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正确吗？

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中叙述他是用什么样的逻辑方法过一个理论关口的，这个关口乍一看来（应当指出：这样看是完全不正确的、极其肤浅的）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学说。他肯定说，这一学说不过是充足理由律的新的说法。但是，充足理由律却根本不能证明任何现存社会制度的正确。如果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有产生和发展专制制度的充足理由，那末，十二月党人的解放运动显然也有其充足的理由。假使专制制度在这种意义上是“合理的”，那末想永远结束这种制度的愿望也同样是“合理的”。因此，赫尔岑肯定说，黑格尔的学说可以说是一切解放斗争的理论根据。这是真正的革命代数学。

从最终的结论来说，赫尔岑是完全对的。但是这一结论他是通过错误的途径得出的。我们现在试举例来说明这点。

恩格斯在发挥黑格尔的思想时说道：“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试问：为什么帝国代替了共和国呢？充足理由律只向我们证明说：这个事实不能是毫无原因的。可是，应当在何处找寻该事实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它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线索。也许

共和国之所以让位于帝国是因为凯撒比庞培具有更大的军事天才；或许是因为卡西乌斯和布鲁土斯犯了错误；也许是因为屋大维诡计多端；也许还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但黑格尔并不满意诸如此类的解释。按照黑格尔的见解，偶然性只不过是外壳，在其下面隐藏着必然性。当然，关于必然性的概念也可以极肤浅地加以解释；可以这样说，罗马共和国的崩溃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只是因为凯撒战胜了庞培。但是在黑格尔的学说里，这一概念具有另一种无比深刻的意义。假使黑格尔说某一社会现象是必然的，那在他看来，这就是说，这种现象是为它所在的那个国家以往的整个发展进程所准备好了的。正是在这种进程中应当去寻找此种现象的原因。因而，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崩溃，不是因为凯撒有天才，布鲁土斯有错误，或者因为其他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有错误，而是因为，在罗马的内部关系方面发生了某种变动，由于这些变动才使得共和国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变动呢？对于这一类的问题，黑格尔本人的回答常常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黑格尔对社会现象所持的观点，比起那些只懂得**没有原因就没有行动**的人的观点来，要深刻得多。但还不止此。黑格尔还强调指出了**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真理**。他说：任何一类现象的总和，在其发展过程中，**从自身中**创造出否定它即消灭它的那种力量，因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从自身中**创造出那种摧毁它和用新制度来代替它的社会力量。由此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下列的结论（尽

管黑格尔并没有强调指出这一点)：如果我对某一社会制度抱否定的态度，那末，我的这种否定只有当它符合于这种制度内部所产生的那种客观的否定过程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种制度失去其历史意义而和产生它的那些社会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才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试将这种观点应用于曾使三十年代的俄国知识青年激动的那些社会问题。俄国的“现实”——农奴制、专制制度、具有无上权力的警察、书报检查机关等等——在这些青年看来显然是腐朽的、不正当的。因此他们不禁以同情的心情回想起不久以前十二月党人想改善我们社会关系的尝试。但是他们，至少是其中最具有才干的人，已经不满足于十八世纪的任何抽象的革命的否定，不满足于浪漫主义者的任何自负的和自私的否定。由于黑格尔的缘故，这些青年的要求已经更加严格了。他们对自己说：“证明自己否定的合理性吧！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证明自己否定的正确吧！或者就把这种否定当做个人的嗜好、孩童的任性而抛弃吧！”但是，用俄国现实本身的内部发展规律来证明对这种现实的否定的正确，就是解决一个黑格尔本人不能胜任的任务。就拿俄国农奴制来说吧。要证明对这个制度的否定是正确的，就是要指出：这个制度**自己在否定自己**，也就是说，现在它已经不能满足产生它的那些社会需要了。究竟是哪些社会需要促使俄国农奴制产生的呢？这就是国家的经济需要，如果国家不使农民变成农奴，它就会因经济枯竭而灭亡。因而应当指出，在十九世纪，农奴制已经

成了满足国家经济需要的最坏的手段，它不仅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反而直接妨碍这些需要的满足。后来克里木战争就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切。然而我们再重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乃是黑格尔本人所不能办到的。按照黑格尔哲学的直接意思来说，其结论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历史运动的原因是在它的内部发展中。这就正确地指出了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可是黑格尔本人违背了，而且也不能不违背这一非常正确的观点。“绝对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观念”的逻辑特性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原因。这样一来，观念的特性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了。每当重大历史问题摆在黑格尔面前的时候，他首先用这些特性来说明它。但这样做就是扔掉历史的基础，并自愿地使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黑格尔作为一个极伟大的、真正天才的人物，也觉得事情并不十分妙，老实说，他的解释完全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因此，他在给“观念”以应有的估价以后，就赶快下降到具体的历史的基础上，寻找社会现象的真实原因，但已不是在观念的特性中，而在当时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本身中去寻找了。同时他时常发表一些最有天才的猜测（因为他看出历史运动的**经济原因**）。但天才的猜测毕竟是猜测而已。它们缺乏牢固的、恒久的基础，因而在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的历史观点中，它们也没有起重大的作用。因此当这些猜测发表出来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受到重视。

黑格尔给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所指出的伟大任务，始

终没有被解决：人类历史运动的真正的内部原因仍然没有找到。不言而喻，当时在俄国不可能出现一个能够找到这些原因的人，因为俄国的社会关系太不发达，俄国的社会停滞现象太顽固，以致这些所要寻找的原因不可能浮现到俄国社会现象的表面上来。这些原因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西方，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来了。然而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若干年之后，在我们所谈到的那一时期里，那里的黑格尔主义者——否定派还陷在唯心主义的矛盾中。叙述过这一切之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俄国年轻的黑格尔信徒开始就和俄国的“现实”彻底妥协，顺便提一句，俄国的“现实”是非常腐朽的，大概连黑格尔本人也永远不会承认它是“现实的”。他们对现实的这种否定态度，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证明，因而在他们看来就丧失了任何合理的存在权。他们放弃这种态度，自我牺牲地和大公无私地为哲学的忠诚而牺牲自己的社会愿望。不过另一方面现实本身却又迫使他们不能作出这种牺牲。腐朽不堪的现实每日每时都在使他们望而生厌，**迫使他们**无论如何要采取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充足的理论根据，但也要采取否定态度。可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们对现实的坚持让了步。别林斯基扔掉了黑格尔的“哲学帽子”后，就激烈地攻击不久前还为他所维护的制度。当然，从别林斯基方面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不过必须承认，由于这样一种做法，这位天才的著作家降低了自己**理论上的严格要求**，就承认了：自己以及以自己为代表的整个俄国先进思想界，**对理论来说**，

是没有偿还能力的负责人⁹。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有时对俄国社会生活说出极其深刻的看法。例如，他在四十年代末的一封信中说，只有资产阶级即只有资本主义才为真正地、顺利地否定丑恶的俄国现实创造基础¹⁰。但是总的说来，在他所谓的否定中，对社会现象仍然抱着**空想主义**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的“主观的”著作家以及〈同时代的〉各派革命家都抱着类似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事情愈向前进展，黑格尔被忘记得愈干净，俄国的否定派就愈少意识到他们的社会观点渊源于某种理论上的错误。我们的“主观的”著作家们把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当作信条。他们竭力向俄国社会思想界证明理论的贫乏，以为他们在给俄国社会思想界制造一种最称心的和有价值的文件。但这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些挫折，足以使俄国社会思想界不再醉心于自己的一些没有根据的论点。在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哲学“颠倒过来”之后，即把他的哲学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后，四十年代俄国的一些哲学小组未能解决的理论任务就很容易解决了。马克思已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内部原因。剩下要做的只是用马克思的观点去观察俄国的社会关系。而社会民主党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常常是殊途同归地得出对俄国生活的相同看法。以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思想界终于汇成一条十九世纪科学思想的洪流。旧的西欧主义者的理论错误得到了补救，因为在**俄国的现实本身中**已经找到把这种现实加以否定的牢固的**客观基础**。〈参看

我的文章《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纪念》，载于《新时代》1891年第11期以及1898年我在日内瓦的讲演《维·格·别林斯基》¹¹。——第9页。

● 黑格尔主义者恒宁格在1827年开始出版《科学评论年鉴》，来传布和捍卫其老师的观点。但是恒宁格抱着保守派的观点，所以他的杂志不能满足青年黑格尔派。在1838年，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创办了《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在1841年，该杂志迁到莱比锡出版，同时改名为《德国年鉴》。《德国年鉴》无论在宗教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抱着激进派的观点。1843年该杂志在萨克森被查封，当时阿·卢格和马克思决定在巴黎继续出版该杂志，定名为《德法年鉴》。该杂志的撰稿人有恩格斯和海涅。然而很遗憾，《德法年鉴》仅仅出过一期双刊号。顺便提一下，在这一期中曾刊载有马克思的出色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在日内瓦用俄文出版）和《论犹太人问题》，以及恩格斯的同样出色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8期上曾转载过此文¹²。

《莱茵报》¹³是康普豪森、汉泽曼及其同道者在科伦创办的。马克思是该报的最积极的最有才干的撰稿人。1842年〈10月中旬〉，他当了该报的编辑。当时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¹⁴，然而他对政府的抨击却非常尖锐，以致他主编的这个报纸只存在了几个月。〈1843年3月17日的该报上登有一个简短启事：“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黑

体字是原来就有的)。根据政府 1843 年 1 月 25 日的决定,该报必须在同年 3 月 31 日停刊。而编辑部在规定日期的前几天即在 3 月 28 日就停止了该报的发行。但马克思却几乎为它的停刊而高兴。以往的写作活动,使他深感自己**经济**知识的不足,所以他想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对《科伦日报》¹⁵的猛烈讨伐,使得马克思有可能暂时埋头于书房。当马克思重新登上写作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舞台时,他不仅具有了原先缺乏的渊博学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经济科学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看法在经济学史上是划时代的。

〈刊登在该报上的马克思的最著名的论文,不久前由梅林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1850)》第 1 卷第 208—321 页中。对于俄国读者来说,这几篇文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失去政论性的意义。另外再补充一句,这些论文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¹⁶

1848 年 6 月,在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和威廉·沃尔弗(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献给他的)的参加下,马克思在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马克思及其最主要的撰稿人在该报上所发表的言论已表明他们是信念十分坚定的、最新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了,这种意义是他们的工作赋予的。甚至敌人也承认,《新莱茵报》是当时最出色的报纸。但是,关于该报可以而且应该说的比这点还要多: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报纸,都不能同它相比。该报于 1849 年 6 月因公开号召“不服从当局”而被查封,当时受到了革命打击的当局已经迅速地恢复过来了。¹⁷——第 15 页。

④ 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细心，俄国读者至今还很少知道恩格斯所谈到的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的观点。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里把他们的观点简略地叙述一下，并不是多余的。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深信，所谓圣经是由神（圣灵）口授并且是由神选择的某个圣者记录下来的，那末，你们就不许有这样的想法：在圣经中会有什么〈错误和〉不合理的地方。那里所说的一切，在你们看来，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事实的意义。大蛇在引诱夏娃时，口吐人言，这些话就象一个曲意奉承和老于世故的伪善者所说的。这有点奇怪；但是，对于神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所感到的奇怪只不过是神的万能的一个新例证而已。大家熟知的巴兰的驴，忽吐人言，和自己的乘客交谈。这又是一个极非寻常的现象；但是，按照那个一成不变的公式，对于神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东西〈甚至奇谈怪论：credo quia absurdum〉也不能使信仰困惑起来。信仰是“对信赖者的示知，是看不见的物的揭示，也就是说，把看不见的东西，信为好象是看得见的东西，把希望和期待的东西信为好象是真有的东西”。对于一个信教的人来说，神的、自然界创造主和主宰的万能，正是他所最“期望”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和自然界作斗争时，没有被迫去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也就是说，没有被迫去逐渐地研究这个自然界本身的规律，那末，上述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动人的，甚至都是非常可靠的。一旦人吃了有害的“知善恶树”上的

果子，他就不是那么容易地受谎言的影响了。即使他还是按照旧习惯继续相信神的万能，但他的信仰已经具有了另一种性质：神已退到世界舞台的后面，具有永恒不变的铁一般的规律的自然界已居于首位了。但是，奇迹是和规律性不能调和的：规律性不给奇迹以容身之地；而奇迹则否定规律性。现在且问：懂得了自然界的不变规律的人们如何对待圣经上的奇迹故事呢？他们不得不**否定**这些故事。但否定所采取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这要根据产生这一理性思潮的社会生活的性质和进程而定。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简单地嘲笑过圣经上的故事，认为它们是愚昧无知或者甚至是欺骗行为的表现。法国人的这种对圣经的激烈的否定的态度，是由当时该国第三等级所进行的反对一般“特权阶级”、尤其是反对僧侣阶级的斗争所决定的。在那时新教的德国，情况就不一样了。第一，自宗教改革后，僧侣阶级本身在德国再没有起过象它在天主教的国家里所起的那种作用；第二，德国的“第三等级”当时还远未想到反对“旧制度”。这些情况使十八世纪德国全部著述史受到了影响。当法国的第三等级的有教养的代表利用科学的每一个新结论〈每一个新假说〉作为反对那些在腐朽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观念和概念的武器时，在德国，与其说是**根绝**旧的偏见，倒不如说是使它们和新发现**协调**起来。在具有革命情绪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看来，宗教是**愚昧和欺骗**的产物。在德国的启蒙运动的拥护者看来，甚至在其中最先进的人〈例如莱辛〉看来，宗教是“对人